

济状况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。经济上的困境，客观上为她之后的走红与争议埋下了伏笔。

2013年，19岁的吴柳芳拼完了最后一届全运会。同年，她在天津东亚运动会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，夺得女团冠军。之后，她根据政策，入学北京体育大学，在2018年毕业。

毕业后，和所有退役运动员一样，吴柳芳面临转型的选择。保守和传统的选项是争取留在省队，后续可能有机会当体操助理教练，或者在体制内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。另一条路，是一次性领取退役金，然后自主创业，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。

从4岁开始练习体操，吴柳芳长期活在运动员的“泡泡”里。她其实早已有“走

出去看看”的念头。她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回忆，少年时代她常常和队友坐高铁出去参赛。学校放寒暑假时，她在高铁上看到其他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出游，不停地给孩子喂零食。

“其实我们很羡慕，羡慕那些孩子自由的童年，什么都可以吃，也可以到处旅游。”

退役之前，吴柳芳对自由的向往已经积蓄了很久。加之2018年前后体育市场活跃，她觉得前景可期，值得闯一闯。

但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。

吴柳芳和家人长期租房生活，如果选择领取退役金，就能为家里支付一套新房的

首付款。在她的记忆里，从小到大，出租房里常有老鼠出没，洗热水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后来，拿到退役金换来的新房钥匙，吴柳芳开心极了。2019年，忙完了毕业和买房的人生大事，吴柳芳到杭州一家体育公司，做“体操进校园”项目。合同两年，第一年月薪不到4000元，第二年涨到6000元。

刚到杭州时，她在生活开销上依然精打细算。她告诉记者，一度只能合租，而且自己选了朝北的房间，因为更便宜。南方的冬天异常湿冷，她记得那个月租1800元的房间，很难见到阳光。

没过多久，公司受疫情影响，经营出现了困难，吴柳芳的工资随即被拖欠。她开始尝试更多可能，一边学舞蹈，争取考出舞蹈教师资格证；一边跳槽到杭州一家体校，当体操教练。体校告诉她，要先签合同上岗，编制要等机会。等了两年，编制没来，工资比第一份工作还要低。

在体校工作期间，有一次放假，吴柳芳回了柳州老家。父亲在车站接上她，直奔医院。直到这一天她才知道，母亲刚刚做完恶性肿瘤手



运动生涯时的吴柳芳在比赛中。